

方壮璧逝世三周年

——陈新嵘——

今年2月6日是方壮璧逝世3周年。

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方壮璧是新加坡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斗争中，一位非常杰出的地下工作者。他在泰南去世时，享年78岁。

去年10月，吉隆坡的“马来西亚策略咨询研究中心”出版了《‘马共全权代表’方壮璧回忆录》。版权所有人是方壮璧的太太兼战友郑红英。

看到这本回忆录的面市，我太高兴了！

两年前我写过一篇《方壮璧抱憾离去一周年》的文章，说明我所敬重的这位好友，是由于决心要为在泰南勿洞和平村定居的战友们做点事，发展村的旅游业，以致劳累过度，未能完成他原定的写作计划而抱憾离去。我未能协助他为村民做事，减轻他的劳累，我是于心有愧的。对于他尚未重新写完他的《我们这一代》丛书的第四本就匆匆离去，我和许多朋友们都深感可惜。

现在，在他逝世三周年的三四个月前，人们终于盼望到《方壮璧回忆录》的出版，说明了方太太在实现老方的遗愿方面作出了外人所不知道的努力。我要向她表示衷心感谢！因为方壮璧的这本回忆录，和同时面世的《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一样，提供了研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新加坡历史进程所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人们从中看到了作者的成长过程，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作者的个性和为人，以及影响和决定作者思想发展趋向的各种因素。

例如，方壮璧写道：“实在的，对我来说追随共产党并不是为了什么共产主义。追随共产党，仅仅是对殖民地黑暗社会，对殖民地恐怖统治的一种挑战。追随共产党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和平民主的唯一生路。”“……可以说，对我左倾思想意识的形成砸下根基，打下烙印的，莫过于社会实际，生活的经历和锻炼。……”

谈到在英校念书时，他曾经在“紧急法令”下被无故逮捕又不明不白地被释放，方壮璧写道：“如果我不是这样地被人不当人看待，我就不能兴起真正立地顶天的豪情。如果我不是被彻底地剥夺了自由，我也就不可能奋发起为捍卫自由而准备斗争到底的决心。”

1950年9月，拒绝刊登政府反共文告的华文报《南侨日报》被封。不久之后，英殖民当局出赏格通缉三个人

。第一个是引导方壮璧加入抗英斗争队伍的报馆同事余柱业，悬赏5千大元。第二个是马来亚民主同盟的林建才律师，同样悬赏5千大元。第三个方壮璧，三千大元。当时方壮璧才24岁。回忆起这件事时，老方写道：“老余和林先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和有声望的政治活动家，而我本人不外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政治见习生。”

《回忆录》里有这样的一段陈述：“新加坡的党组织，自50年代开始，就不断遭受敌人进攻。到50年代中，组织机构基本上已经彻底崩溃而不复存在。所剩的主要干部是一名流亡国外的‘学委’的成员，和原市委直属机构的余柱业和我自己。余已出国，只有我一个留驻新加坡。...传统的党组织形式，包括党章所规定的党组织活动，都已经完全停止了。我自己是从未参加过党组织生活的党干部。...”

这些情况的披露，是不是有助于人们纠正他们（对马共的）认识上的盲点呢？

《方壮璧回忆录》也回答了有人认为“方壮璧对李光耀有幻想”“斗不过李光耀”等等见解，并对一些不符事实的传说和“无中生有”的“故事”，作了必要的澄清

。该书的附录《‘天若有情’谈笑间》一文，老方就1950年代末新加坡反殖斗争中发生的“郑越东事件”和“人民党候选人事件”作了检讨。他承认“这两个问题处理得十分笨拙，是两项错误的决定。”“是两大败笔。”同时也表示他不能接受对1963年“二二大逮捕”事件的发生“好像整个‘冷藏行动’也是‘全权代表’的罪过造成的”这种推论和分析。

《回忆录》作者没有提到他在流亡印尼期间和来到泰马边区武装战线参加工作的经历。如果不是因为“走得太匆速”，来不及写出来，或者正如他在回忆录里所说的“即使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在现有的政治情况下，还不是可以让我真人真事，原原本本地把发生过的各项感人事迹说出来的时候。”

我以这篇文稿向有兴趣多知道些新加坡政坛陈年旧事的报刊读者推荐《方壮璧回忆录》，作为我个人对老朋友逝世三周年的一种悼念方式，不知是否合适？

（2007年元月30日写于泰南合艾）

吴庆瑞对马共斗争的看法



●陈新峰

吴庆瑞博士，是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第一代的核心领导人，是新加坡经济繁荣的奠基者。他欠缺李光耀的外才，也不那么能言善辩，却是个学识渊博，讲求实效，熟悉新加坡各方面情况的谋略家。

他出生在马六甲一个并不富裕的“峇峇”家庭，在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毕业后，当上殖民地政府的公务员，任职于社会福利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获奖学金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念经济，取得博士学位。可能是受当时执政的英国工党主流思想的熏陶，他成为一个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通过经济手段调和阶级矛盾的费边社会主义者。当以李光耀律师

作为发展中国家最杰出的一位财政部长，吴庆瑞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初期，被北京聘请做中国沿海经济开发区的顾问。

为首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标榜反对殖民主义，并依靠左翼进步力量，在1959年5月新加坡立法议会大选赢得压倒性胜利，成为自治邦政府的执政党的时候，吴庆瑞在李光耀身边为行动党出谋献策。

在公开进入人民行动党领导班子之前，吴庆瑞是林德宪制下的林有福首席部长的经济顾问，对新加坡各行业、各阶层的处境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辞去经济顾问之后，他进入当时还是在野的人民行动党的决策班子。行动党参加1959年立法议会大选，就是根据吴庆瑞所做的选区分析配置候选人，把低收入、不会说英语的不满现状的华族选民占绝大多数的“安全区”，全都率先分配给李光耀认为必需当选的行动党领导班子成员。大选结果，人民行动党赢得立法议会51个议席的43席；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王永元、拉惹勒南、贝恩、王邦文、杨玉麟等党中央委员都以压倒性多数票当选。李光耀从此当上了新加坡总理；吴庆瑞则先后担任过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副总理、金融管理局主席等要职，直至退休。作为发展中国家最杰出的一位财政部长，他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初期，被北京聘请做中国沿海经济开发区的顾问。

拟狮城首届财经政策

据我所知，行动党上台执政的初期，稳定社会、巩

固政权的政策措施，大都出自吴庆瑞的主意。例如：加薪给公务员；开办“公务员政治训练班”，让习惯于听从英国官员驱使的公务员认识李光耀政权绝非共产党同路人；成立听命于政府的职工总会；设立安置支持行动党的求职青年的“建国队”；成立和城乡民众团体抗衡、争取群众支持政府的“人民协会”；开办让行动党立法议员了解政府各部门职能的“学习班”……等等。他根据较早时亚洲开发银行用了近两年时间对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情况进行调查所写的报告书，拟定第一届新加坡自治邦政府的财经政策。他也为行动党政权清除了公务员队伍中亲林有福、蔑视和敌视李光耀的极右派，让他们知难而退，自动离职。可以这么说：当年如没吴庆瑞，李光耀总理难当。

我对吴庆瑞印象深刻，原因是双方有过不少“听其言，观其行”的机会。他生活作风简朴而严肃，观察敏锐，善于思考，说话言简意赅、有广度和深度，外表有点大智若愚，是个学者型的以实践费边社会主义对抗共产主义为职志的谋略家。

当年他辞去首席部长林有福经济顾问职位之后，经常到人民行动党总部走动。他主动在他的纳孙路住所为我们几个行动党总部的工作人员（包括刘坡得、陈志成和我）开课讲授“经济增长原理”。讲课时，他一再用具具体事例说明不同的地理和

自然环境对人们生活习惯以及传统教育所产生影响；阐述不同民族对待事物和对待生活也就心态不一样。他提到华文小学课本里的“蜜蜂在春天勤劳采蜜以便过冬”的故事，马来小学课本里就没有。原因是马来亚半岛这里没有冬天。生活环境不一样，马来人就没有“积谷防饥”、“养儿防老”的成语。

对中国经济的远见

勤劳、节约、储蓄这些观念的强弱，和国民经济的的增长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课题讨论时，他曾向我们指出：倘若中国继续放任人口增长，不加控制，经济增长就会被抵消，永远上不去。

吴庆瑞当上财政部长时，我和陈志成等四人被选派去以色列参加一项由以色列国防部主办的“体育与青年领袖培训课程”。三个月的课程结束后，他特意安排我们继续访问考察执政的以色列工党的党校、职工总会和耶路撒冷市议会。在左派工党执政下的以色列，那时候被认为是具体落实费边社会主义的典范。一位接待我的以色列外交部官员告诉我说：“你在以色列到过的地方比你们的吴庆瑞博士多。他每次一来就借了一大堆书走进旅店客房里埋头阅读一整天，然后就依约去见我们的部长和教授探讨问题、交换意见，很少去名胜浏览古迹观光。”

（上篇）

需耐心慢行。最内路霸，心惊胆“受伤”回家！



公路心声

陈于逸

2005年3月15日 ● 星期二

南洋商報
NANYANG SIANG PAU

● 陈新嵘

吴庆瑞对 马共斗争的看法

当年行动党上台，警方政治部提出调查报告，建议教育部长拒绝批准被列入黑名单南大毕业生要当教师的申请。对此，吴庆瑞主张改由他的财政部录用他们。他说：“我会把这些人安插在税务局，让他们天天面对税务表，面对一大堆数目字，面对包围着他们的受英文教育的公务员同事。我也可以派这些好汉去政府各个米仓查看有没有老鼠。这么一来，他们还能颠覆什么？”

“……如果政府不肯花450块钱录用这些能理论、会写文章的南大精英，他们将会接受200块的月薪，到一些不满现状的工会去当秘书，天天发表文告抨击政府，给政府添麻烦，那时我们还得花钱找人去反驳，可就更不合算啦！……”

看来是出于同样逻辑，吴庆瑞选了行动党上台后刚释放出狱的林清祥到财政部当他的有名无实的所谓“政治秘书”。让这位著名工运领袖天天“上班”，泡咖啡、翻阅书报杂志、脱离群众、闲得发慌。

这期间，有一天我去财政部会客室找财经月刊看，顺便到老林的办公室打个招呼表示关心。闲聊时清祥向我吐苦水说，吴财长还曾经试图差使他到那些酝酿罢工的工会去“化解”工潮。我说，精于算盘的吴博士是不会让你白领干薪的呀！

有一次，柔佛州苏丹在皇宫设午宴接待李光耀总理。作为随员之一，我在宴席上坐在吴财长身旁。那时我“刚出道”，官场阅历不够，当我看到走进宴会厅的大臣们一个个的服饰打扮，一时暗中好奇。

当时注意到我脸上表情的吴博士，马上示意我不可失礼。他低声耳语提醒我新加坡和柔佛统治者搞好关系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新加坡能够利用柔佛州一半的土地，我们面对的难题就可以解决啦！”

对马共前景的见解

行动党分裂，社阵成立前夕，我到财政部向吴博士“话别”，感谢他曾经让我有机会到以色列增长见识，但如今却不得不和已经公开反共的人民行动党分道扬镳。他叫人送来两份茶水，友善地说：“鉴于你的教育和家庭背景，我对你现在选择了要走的路不感意外。”他向我阐述他的一番对马共前景的见解。他认为：共产党干部和华人知识分子，无论马来语说得多么到家，也争取不到马来人。马来群众向来听从统治者，如今还是受传统观念影响。只有等到受现代教育的马来知识分子过剩，由他们去唤醒马来工农，马共的斗争才会有希望。

他说：“依我看，在能看得见的将来，马来知识分子三几十年内不会过剩。而且，政府可以使用两手去安置那些对现状有怨气的马来知识阶层。”他的这番话是半个世纪前说的。那时候，我能找到可以用来反驳的理由吗？

当年，名为“冷藏行动”的打击新加坡左翼进步力量的二·二大逮捕之后，立法议会召开例会。作为14名社阵议员之一的我，在会议稍歇时到休息大厅碰见吴庆瑞。他手上拿着一杯啤酒笑着向我走来，对我说了句示意我可能被捕的话，问我（在牢里）“能耐多久？”我毫不迟疑回答说“托送我去以色列操练的福，相信至少能Tahan五年！”他说：“只要PAP还掌权，你不至于会有问题。可是，一旦实践（新马）合并，你得自我保重啦！”他然后又说了些暗示要我“回头是岸”、“既往不咎”之类的话。我唯有报以一句“Thank you！”我心想这是他的一惯谋略：不让对手争取到一切可用之才！

上述关于我和吴庆瑞打交道的一些零碎故事，或许可以让读者了解这位行动党功臣的政治信念，当年他所扮演角色的一些方面，以及他和我的“恩恩怨怨”。

顺便补充一点：好几年前，有一位前行动党议员又是前社阵议员的老友来合艾相聚话旧。聊起吴庆瑞，他说：“如果吴博士是新加坡总理，我相信老哥你早就能够回老家新加坡了。”

（写于泰国合艾）

（下篇）

（作者按）：这篇文稿于2月14日托人带去吉隆坡投给《南洋商报》，起初传来消息说，报馆有顾虑，怕会‘得罪’李光耀。没有料到，3月14日分两天在它的《言论》版刊出。文稿原来的题目《我所认识的吴庆瑞》被改成《吴庆瑞对马共斗争的看法》，而且被列为对陈平《我方的历史》一书的所谓“回响”。有一些被认为是“敏感”的字句被删去。修改题目和删去若干句字，可能出于编者“好意”，但没有征求过文章作者的同意。作者写这篇文稿时，完全没有所谓“回响”的意思。



前马共成员陈新峰
读《吴庆瑞传略》

8 987181 600005
MICA (P) 14/07/2007
今天50大版 / 售价75¢

2008年1月3日 Thursday 星期四 农历丁亥年十一月廿五

不久前，我怀着极大兴趣读完了新加坡朋友寄来的《吴庆瑞传略》（英文版），一本对了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历史进程很有参考价值的好书。作者陈淑珊是吴庆瑞的媳妇。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老一辈人都知道，吴庆瑞是那个年代新加坡李光耀政府不可缺少的智囊。他是公认的新加坡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杰出的策划师和奠基人。可以说，李光耀当年身边如果没有吴庆瑞的效力，总理是难当的。如果没有吴庆瑞的搭配，很难想象新加坡会有今天。

吴庆瑞现年88岁，健康欠佳。《吴庆瑞传略》全书222页，概述了这位新加坡开国元勋从1918年出生到1984年退出政坛、退休后1990以新加坡普通公民身份应聘当中国沿海特区经济发展顾问，以及晚年的家庭生活等等各个阶段的事迹，写得精炼、生动，显示出《传略》作者的现代教育素养和为出版这本传略付出的努力。

吴庆瑞出生在英属海峡殖民地马六甲，早年在新加坡英殖民政府开办的莱佛士学院受教育的时候就热衷于经济学，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他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创始人之一。在新加坡历届政府中担任过财政部长、国防部长、教育部长、副总理以及金融管理局主席等要职。他的媳妇说：“这不是一本得到吴庆瑞授权的传记”。她公开说明：促使她下决心写这本传记，原是为了让儿子（也就是吴博士的孙子）吴韶毅了解他祖父对新加坡的贡献。

有报道说，在这本传略出版前夕，吴庆瑞现在的老伴潘瑞娘发表声明，表示吴庆瑞没有同意写传记，不希望有任何关于他的书籍。她还表示“这本书的出版违背了吴博士的意愿，也对吴博士不敬。”

何以吴庆瑞不愿意出传记呢？何以其孙子对名声显赫的祖父的事迹不甚了呢？

确实是引人兴趣的社会现象。曾经和吴博士相熟的我，很想能有机会再见面，表达我对他的思念和问候，虽然我和这位我所敬重的比我年长14岁的长者早已各行其道，有各自的人生志趣。

读《吴庆瑞传略》拉杂谈

● 陈新峰

我和吴庆瑞相识乃几十年前的事。

那时候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吴庆瑞辞去首席部长林有福经济顾问的职务后，时常到桥南路的人民行动党总部走动。我那时负责出版行动党的华文版机关报《行动报》，也协助组织秘书王邦文印写文件，时不时有机会和吴博士闲聊，听他讲曾经去过布达佩斯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感受。他邀我去下象棋，顺便练习他曾经学过的广州话。稍后，他特地为陈志成、刘波得和我等几个年轻人开班，讲授《经济发展原理》。

没有华校生的屈辱感

我当上总理署政务次长不久，吴庆瑞挑选我带领一个四人代表团参加以色列国防部的“体育及青年领袖训练班”，安排我们考察以色列工党政府的学校、职工总会、耶路撒冷市议会、社会福利机构等，向以色列人取经，开拓视野。就这样，吴庆瑞和我都互相有过一定程度的认识。

在我的印象中，吴庆瑞是一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学说、但主张用经济杠杆来调和阶级矛盾、反对共产党搞阶级斗争的费边社会主义者。他是受殖民地的英校教育的土生华人，不懂华语，没有受过英校的教育那种民族屈辱感。他那个圈子的社会精英们都缺少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罪恶的痛恨，用不同于受华文教育者的眼光看待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在留学英国期间受到工党政府主流思想的熏陶，有兴趣从经济角度了解和同情弱势群体。存在决定意识。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我就是带着对吴庆瑞的这种印象和已有的认识去读《吴庆瑞传略》的。我觉得

得这本传略写得真实。

我读《吴庆瑞传略》有亲切感，因为书中提到的好些人，如林金山、余柱业、沙玛、温华想、贝恩、波卡斯、陈文德等等，我和他们都有过或多或少少的接触。我觉得，他们都是些有才华而且为人正派的老实人，虽然他们的政治信念有左、有中、有右，但都是政治野心家。

善于掌握马来领导层心态

我对《吴庆瑞传略》第三章：《进入和脱离马来西亚》特感兴趣。因为，新加坡被并入和被脱离马来西亚这段时期，我在印尼过着流亡生活。这一章形象而生动的叙述让我看到吴庆瑞在“新加坡进入马来西亚”这一历史大事中所担当的角色。显然，吴庆瑞比较熟悉和善于掌握马来领导层的心态。他和东姑阿都拉曼政府的财政部长陈修信有点亲戚关系，同那位和李光耀不啻为弦的敦拉曼副首相谈得来。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和敦拉曼都对他没有戒心。我以为，这一章提供了不少后人了解新马历史关系的注释。

《传略》描述的吴庆瑞的个性，我是认同的。他确实是人民行动党第一代领导人中最勤于阅读，勇于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挑战的谋略家。他不断充实自己的学识、处事讲求实效，言简意赅、重知识、重人才，习惯于冷静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在决策问题上他敢“顶撞”李光耀，固然有各种原因，但我以为他作为对新加坡每个选区各阶层人民生活状况做过大量调查的经济学者，他坚持己见，主要是出于他专注于发挥自己的专才，没有政治野心，也因此得到李的尊重。

吴庆瑞是幸运的，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恰好提供他可以自由自在地施展拳脚的平台，为共和国站稳脚跟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这样一位杰出人物不写自传，如果仅仅是出于“居功不做”的品德，这对有志从前辈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营养的后人，未免可惜！

吴庆瑞人情味的一面

《传略》还提到他帮助政见相左的老同学、老朋友余柱业和沙玛晚年回到新加坡生活和工作的，也就让读者看到晚年的吴庆瑞博士颇有人情味的一面。

新加坡《联合早报》有一位专栏作者认为“传略不是吴博士亲笔撰写，也不是他亲自口述，顶多只能说是对这位开国元老侧写，对了解这个人的生平有一定的帮助，却完全无法洞悉他的内心世界，无法记述他在那个伟大时代和诸多重大决策时刻的亲身经历和所思所想。因此，我们只能希望吴博士的口述历史纪录有朝一日也能够出版，公诸于世。”我赞同这位专栏作者的见解。

吴庆瑞是幸运的，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恰好提供他可以自由自在地施展拳脚的平台，为共和国站稳脚跟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这样一位杰出人物不写自传，如果仅仅是出于“居功不做”的品德，这对有志从前辈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营养的后人，未免可惜！

作者现年74岁，在自治邦时期，曾是代表人民行动党的立法议员，并担任新加坡总理公署政务次长，之后加入社会主义阵线阵营。马共成员，曾在马来西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服务。目前是泰国公民。

杰出的费边社会主义实践者

(2010-05-24)

早报导读

● 陈新嵘

致最后敬意——沉痛告别吴庆瑞博士

昨天在国葬礼号角鸣起时，新加坡这个已傲然于世的国家，恭敬地为它永世感激的新加坡之子送别。

胡锦涛促中美 4 新领域合作

鲍盛钢：美国是如何和平崛起的

蔡英文高票蝉联民进党主席 五都人选也确定

吴庆瑞博士是一位献身于实践费边社会主义理想的思想家。他去世了，我怀念他。

作为费边社会主义者，他接受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学说，但认为阶

级矛盾可以借助经济杠杆加以调和，倘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拒绝用经济手段纾解阶级矛盾，必将使整个社会付出沉重代价。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致力于实践他所崇奉的被认为是社会改良主义的费边社会主义。他的运气很好，英殖民主义走向没落的历史进程，新加坡被迫脱离马来西亚的历史进程，为他这位处事认真严肃、讲求实际，对社会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的学者和思想家提供了落实个人理想和抱负，施展个人才华的机遇。

吴庆瑞是幸运的，他碰上了当年需要他在各方面大力协助才能当上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律师。或者说，当年在政坛上初露头角的李光耀律师身边有个足智多谋、不可或缺

的吴庆瑞博士，是李光耀的幸运。

吴庆瑞对新加坡立国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可是人们从未见他居功自傲。

作为杰出的费边社会主义者，他把他的经济专业知识、经验和智慧，提供给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说明他关心改善弱势群体命运的尝试和努力是不分国界的。

吴庆瑞博士是值得我敬佩的一位老前辈。